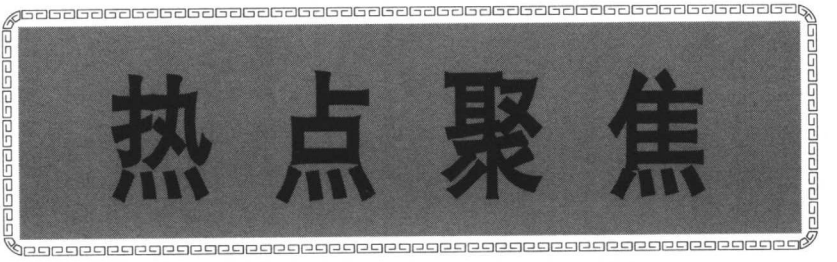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观察

2005 年 卷 第 2 辑



Hot Spots in Focu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教育的未来走向

薛兆丰

中国重视教育，历有传统。但如何办教育，却还需要多下点工夫研究。比如教育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教育究竟能否产业化？推行教育券的困难在哪里？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教育的未来走向，我想多一些讨论，多听一些意见，总是有益无害的吧。

教育是选拔人还是培养人

不是要证明是非黑白，不是那么绝对，我要说的只是一股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中国的教育与美国相比，差距比想象大得多。

一开始，那只是难以名状的感受：虽然看到差别，却不知道根源在哪里。最容易观察到的，是美国学生好问。课堂上，随时有人举手，只要老师不是说到兴头上，就会让他们问。问题一提出来，你会暗暗惊讶：同学们跟得真紧！

第二是学生求学主动。我遇过一次，老师向学生道歉，说上礼拜的作业布置错了，是没有教过的内容，作业不用交了。但这个时候，

作者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博士生。

大家的作业其实已经交齐在讲台上了。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同学们就是懂得各师各法，主动出击。

三是讲座多。大学每个礼拜都举办很多讲座，演讲者不仅有教授，还有记者、法官、企业家，甚至其他学校来的学生。讲座是学校提供的基本服务。只要你到了学校，你就是学者，学者参加讲座是家常便饭。再大的学者，也是找张椅子坐下就听了。

四是学生的阅读面广。美国人爱读书。我说的是书，不只是报纸杂志漫画。地铁、公车、草坪、餐厅，到处都能见到在读书的人。读书不是庄严的事情，无需沐浴更衣，红袖添香。书拿起来就可以读了。而跟专业内的同学交谈，你会发现他们读过很多书。

这些只是零碎的观察，还串不起来。直到最近跟尹忠东谈起中国的教育，老朋友的话才给了我答案。他说：“现在国内的小孩读书很苦，但我想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挑选机制。它是选拔人，而不是培养人。考什么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人选出来。要选拔人,功课能不难吗？”

我恍然大悟，想起经济学家兰斯博格（S. Landsburg）。兰斯博格曾经以经济学教授的身份，给逐渐长大的女儿写过十多条生活忠告，比如怎样砍价等等，而其中一条格外重要：“千万不要在你没兴趣的领域追求成功，因为你得跟那些真有兴趣的人竞争。没有兴趣，你怎么斗得过人家？”

而我们则相反。中国人的教育原则，是千万要在自己没有兴趣的领域顶住，因为你很可能是在跟同样没兴趣的人竞争，所以坚持就是胜利。而所谓的胜利，就是被选拔，没别的意思。

要知道，一个人这么想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一代人这么想这么做，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整个社会一代接一代，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和用人机制，始终都是这么设想和实施的话，那就很不得了了。中美乃至东西方的教育差异，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是要选拔人还是培养人，在于学者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

要改善这个状况，必须从教育制度入手。想要让学者不仅按个性求学，还要在学成后能谋生，被社会接受，就必须把问题交给教育的

自由市场，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让教育产业化和多元化。不搞教育产业化和多元化，中国人的智慧，还会继续被埋没。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停止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水平只会后退，不会前进。传来的消息是：之所以要停止教育产业化，是为了遏制学校乱收费的现象。而教育，据说是应该当作公益、而不是商业来办。

然而，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教育不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任何“质优价廉”的产品，无论汽车、电脑、相机、服装、电影、杂志、美食，都是既允许商人赚钱又不存在政府准入限制的行业；反之，任何“质劣价高”的产品，好像国内的电信、邮政、医疗、药品、教育，都是要么有价格管制，要么有准入限制，要么兼而有之的行业。

是的，学校乱收费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学校乱收费能得逞？最近有三百多位校长因乱收费而被革职。他们难道是商业奇才？难道是土匪强盗？他们若改行卖青菜豆腐，乱收费也能得逞吗？不能。他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求学的人多，而可选择的学校少，学生和家长别无选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除乱收费的校长，有助于减少求学的人数，或增加学位的供应。也就是说，学位的短缺，不会因为革除校长而得到缓解。既然如此，那么禁止学校明码实价收费，就无异于鼓励个别人偷偷摸摸收费——因为不管怎样，学生对学位的激烈竞争，只会从一种形式转成另一种形式，而不会因为“宣布不准乱收费”而减弱或消失。

长期而言，把教育当作公益事业来办，结果就是教育质量下降、下降、再下降。跟花生、大豆、鸡蛋这些商品不同，教育质量是最难衡量、最容易偷工减料的。今天把学费统一压下去，明天师资就统一降下来，将来毕业生的品质更不会无端上升。

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必须指出，鼓励民间办学，与政府资助教育，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政府真想资助贫穷的学生吗？真想缩小贫富学生的差距吗？当然可以，办法就是实施“教育券制度”。它的含义很简单：政府不再把教育基金直接投放给选定的学校，而是先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自由选择民间自由开办的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学校拿着靠实力赚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这个制度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美国各州零星试行，始终得不到普及，原因是阻力太大。阻力来自哪里？来自惯于与世无争的教师，来自惯于接受资助的校长，来自惯于行使拨款大权的官员。但即便如此，由于美国鼓励私人办学，私立学校在缺乏政府资助的竞争劣势下，也仍然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而这么做的阻力，也恰恰来自教师团体和教育部门。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统揽各级办学的审批权，设置办学的准入障碍，对他们有实质好处。这些实质好处很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撼动。但基本国策的设计者和社会评论者，要理解问题的症结倒并不困难。

教育券的困难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推行教育券制度，不仅能显著减少教育经费的错用，还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社会上反对教育券的意见很多，我一直不重视，认为它们都是因为不理解教育券而产生的。但最近忽然察觉并非反对者不明白教育券的好处，而是我不明白教育券的深层困难。

让我先从教育券的含义说起。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兴办教育的

责任不改，对教育的资助金额不减，但不再把教育资金层层下发给学校，而是直接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家长和学生凭“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冲抵学费；成功争取到学生的学校，凭“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教育券的好处是明显的。首先，它更公平。在教育券制度下，地处边远的穷学生也能足额地领取并支配政府在计划中给他们的教育资助；而在传统的做法下，穷学生只要考不上好学校，他们实际能享受的资助，就往往达不到计划中的人均额度，这是因为教育经费的划拨一向很不均匀，能就读好学校的学生，享受了大部分教育经费的缘故。

其次，教育券制度更有效。在传统的做法下，学校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竞争，但这些竞争，主要是面向作为拨款人的上级主管，而不是作为顾客的学生和家长。一旦引入教育券制度，学校和教师就必须直接面对学生、争取学 生、向家长交待。在教育券这种竞争机制下，即使教育经费不增，教育质量也必定大大改善。

再有，教育券制度并不违背政府资助教育的前提。教育券制度本身，只是政府资助的发放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政府资助制度的改革。事实上，政府给每个学生的资助总是多多益善的。但不管多少，这种发放制度，总能减少中间环节的节流和耗损，让资金更大比例地落到受资助的学生和家长手上，供他们直接支配。

教育券的阻力在哪里？我过去的理解，而欧美的经验也证实，阻力来自学校和教师团体。这是因为，学校和教师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原来一些习惯了照本宣科的教师，难以适应市场化的竞争挑战，所以他们会以各种理由反对教育券的实施。

这种阻力中外皆然，是意料之中的。但我认为它在中国并不算大，还可以克服。我过去感到乐观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教师的工资水平不算高，抵抗的积极性不及欧美的大，这一点我至今保持乐观；二是学生和家长都很容易在教育券的实施中尝到好处，从而水到渠成地形成一股压倒性的诉求，这一点我现在认为错了。

在过去倡议教育券的文章中，我曾经作过这样的类比：要是饭

馆的老板无权赚钱，厨师无权决定菜谱，而食客也无需埋单，那样的饭馆能炒出什么菜来？同样，要是校长无权赚钱，教师无权选择学生和教法，而学生也不用付费，那样的教育制度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但我现在却要交待这类比错在哪里。是的，假如政府给每个人100元的伙食补助，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把钱直接交给每个人，让他们自己到市场上选择餐厅是最佳办法。要是把这 100 元层层下发，最后直接补贴给餐厅，然后让每个人到餐厅免费就餐，那么当中就有很大的效益耗损，结果每个人享受的饭菜，可能就只相当于30元的价值。

但到了教育问题，许多人的想法就变了：他们不愿亲手拽着 100 元的教育券，到市场上寻找竞争中的学校，享受价值等于 100 元的教育服务，而宁愿留在旧教育体制里，享受可能只值 30 元的教育服务。这是事实，很多人就是这么选择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在吃饭问题上，他们更倾向于“抛弃公立食堂”，但在教育问题上，他们却更倾向于“保留公立学堂”？他们的选择是理智的吗？

恐怕是理智的，因为人们到食堂是要实实在在地安抚自己肚子，而人们到学堂则很大程度是为了擦亮自己的牌子。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人们关注的，首先不是教育的“质量层面”，而是教育的“标签层面”。人们要的首先是免费的教育，其次才是高质的教育。更直接地说，首先要文凭，其次才要素质。这解释了为什么“公立食堂”和“公立学堂”不能互作类比，为什么“教育市场”比“食品市场”更难让人理解和接受。

许多人相信，不管教学质量如何，“公立学堂”始终是廉价地获取文凭的保证。他们认为，政府普及教育，目的就是让人人都拿到某个程度的文凭，以符合“社会公平”的标准。这样的想法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若人人都有文凭，就达不到最初帮助穷人改善处境的目的，因为若人人都中学毕业，那么就只有大学毕业才吃香；人人都大学毕业，那就只有博士文凭才吃香。

这样看，中国的教育问题错综复杂：教育经费本来就不足，在层

层划拨的体制下，落到学生手上的就更加可怜；教育券改革本可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但除了来自行政机构、学校和教师的阻力外，连家长和学生都可能出于“宁要文凭、不要素质”的考虑而加以反对；教育体系垄断了文凭发放权，在向家长和学生攫取垄断利润后，导致了文凭泛滥；因为水涨船高，学生和家长倾囊而出，为博取更高的文凭苦斗。这是一场恶性循环，代价是中国青年的才华和时光。

乙酉中国金融变革时

巩胜利

甲申 2004 年，中外政界、经济学家、金融家、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政府对金融业实施最彻底的手术：清除不良资产“黑洞”、对国有银行大规模注资，以按国际规则“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对银行进行“强身固本”，可以说都是破釜沉舟的大举措。与此同时，启动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改制上市，这两大金融“航空母舰”的出航，将使得中国的金融秩序、投资环境、资本市场等从源头和本质上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21 世纪初，中国官方公布的“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呆坏账率是 33.37%，2003 年末这个数字下降到了 20.36%，2004 年又有所反弹，增加了 500 亿。中国的国有银行面临一再靠中央政府反复注资、哺乳喂养，但依然长不大、做不强的怪圈。通过改制上市，是不是中国国有银行最后的晚餐？中国的银行业是不是从此就可以突出重围，找到一条自我发展、不断壮大的“柳暗花明”之路？事实上，中国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方向改革，仅仅是揭开了历史的序幕。

作者系《中国投资》杂志华南办事处工作人员。

一、中国金融“大变革”

2004 年是中国金融界 55 年以来最为天翻地覆的一年。据有关媒体报道：2004 年 6 月，中国政府为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国有商业银行再次剥离不良资产 3000 亿元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署，这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转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继 2004 年初对这两家银行注资 450 亿美元，1999 年转移出 14000 亿元不良资产之后，五年内第三次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施以援手。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累积的呆坏账之和超过了 25000 亿元人民币[①]，约占 2003 年度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1999 年，中国政府决定将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改为国有商业银行。“四大银行”提出，由于在专业银行时期形成了太多不良资产，希望由国家处置不良资产，使其大踏步过渡到商业银行。中国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专门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 14000 亿元。按理说，四大国有银行把 14000 亿元人民币不良资产剥离后，应该可以大踏步地走向市场了。但有权威数据显示：到 2001 年 4 月，这“四家”国有银行的呆死坏账又重新聚集到 10000 亿元人民币[②]，而到 2004 年初这“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呆死坏账继续增加到 12000 亿元人民币，2004 年 10 月，中国工商银行又在被国家审计局的审计中发现“死洞”就漏掉 70 多亿。这就是说：自 1999—2004 年这五年时间里，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死坏账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事实的结果是，从 1999 年到现在短短的五年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继续上升，而且盈利水平仍然无法提高。无奈之下，2004 年年初中国政府再次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 450 亿美元，6 月再次剥离不良资产 3000 亿元，并坚决启动了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的进程。与以往政府屡次在困难时施以援手不同，这次启动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实际上是对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四大”国有银行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是对中国银行业的一次根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性改变，之所以讲是根本性改变，是因为中国金融银行业自此将有三个重要的历史标志：(1) 上市新机构甩掉了所有的历史债务和包袱，将按国际金融市场规则来运行，接受国际社会的“阳光化”监督；(2) 改制后的银行将在海内外至少是两三地的资本市场公开挂牌上市；(3) 上市后将按国际资本市场规则实行全流通，割断了历史所留下的尾巴。

二、“大变革”能剔除制度缺陷吗？

为什么对国有银行屡屡施以援手，但却效果不佳？

在 1999—2004 年这五年时间里，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和对银行注资，另一方面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而且盈利水平仍然无法达到世界银行组织的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和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银行业的生态环境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和治理。

如果仅仅是靠政府不断的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来维系国有银行的运营，那么中国政府能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这些垄断的国有商业银行“埋单”、甩掉包袱就走人吗？给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那另外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怎么办？还有更多的商业银行怎么办？如果中央政府可以“注资、甩包袱”就走人，那么各级地方政府是否也可以这样做？除国有四大银行之外，各级地方政府拥有的城市商业银行超过 112 家，它们是否也可以享受反复“注资”和“剥离呆死坏账”同等的“国民待遇”呢？

事实上，在机制和体制都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金融业存在基本的制度缺陷情况下，依靠政府反复的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是完全行不通的，只会使“黑洞”的吞噬能力更强，代价也更大。有学者估计，如果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造，至少也需要 8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新注资本（其中，新注资将需要 800 亿美元左右，再次剥离核销呆死坏账将超过 5000 亿元人民币），对国有银行目前的

困境，想不花点代价就舒舒服服走出来，是不可能的，但如果钱也花了，代价也付了，但制度缺陷依旧，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那就更不值。因此，通过大变革剔除银行业的制度缺陷，对国有银行进行彻底的改造，这才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上“华山”的惟一出路。

三、垄断的中国金融为何长不大？

若按中国政府此次注资、剥离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同样“公平、公正”的思维方式来进行，那么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则至少也需要 8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新注资本。但谁又敢讲，这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最后免费的晚餐呢？关键是中国银行业，需要良性整体的生态环境，为什么非要把中国对金融、银行业的全部“鸡蛋”，都放进国有垄断商业银行这一个篮子里？中国的私人银行，争论了 20 多年，什么时候才能按国际化的金融之路放行？而这实际上是为分散中国金融风险编织的另外一个可以“盛蛋”的篮子。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长期靠政府一统垄断 50 多年，但至今还没有长大，还必须靠政府不断“哺乳”才能生存下去。中国金融界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2004 年底，按中国加入 WTO 的进程步骤、中国银行业就要在大中城市全部向外资开放。但一直都严重短缺金融制衡和发展环境的中国银行业能够生存下去吗？与国外金融业的强势竞争者相比，情况不容乐观。

中国银行业长期的高度国有垄断，不仅没有给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秩序建树起良好的生态环境，反而使中国银行业本身产生了源头的生态机制缺失：高度政府垄断的商业银行，让中国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一心只想吊死在“国家注资、政府埋单”的一棵树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选择。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规模及赢利水平来看，可以清楚知道中国银行业与国际银行业的巨大差距。要知道：像瑞士这样银行业发达的国家，拥有在全球银行业前 10 名排序中的银行就有两家，每一年的营业总额都超过 1000 亿美元以上。

目前，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新动力、新攻势正由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开始形成，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也将在 2005 年前后接受脱胎换骨的彻底洗礼。就是完成中国大型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改造，中国金融依然需要在整体金融生态环境中“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地继续前行，以使中国金融业生成并发挥出新金融的新动力，而不再形成、积累、打成新的“中国结”。这需要中国政府管制金融的生态环境发生根本的变化，特别是以“政府投资”、政府“批权”的行政与市场经济环境必须得到根本的改变。否则，就可能像以往一样，再次掉入“呆死坏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担心的中国金融危机就可能会真的爆发。中国加入 WTO ，对外资银行开放度的不断加大，使得中国金融业在走向世界的同时，面临着灾难与机遇的同时降临，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于 2004 年 8 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 2004 中国金融国际年会”发表演讲时所说：中国金融风险的阴影已经越来越严重，一旦外资银行分流中国银行新的储蓄存款，国有银行不再拥有稀释其不良资产的功能，将可能诱发中国的金融危机。

四、金融“变革”依然有 5 年的悬疑

2004 年 12 月 2 日，中国《法制晚报》首先披露，中国第一家实施成功改制、等待在全球数个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银行股份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规则。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的资料显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中国国家持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法人、自然人全为一人”,目前是‘中国银行’惟一、独家垄断的股东。这就是说，不管是按中国的《公司法》还是按国际资本市场及美国“股份制公司”上市法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有可能被拒之“公开上市发行股票”门外，因为“独资、单一股东”企业，事实上已经不是“股份制公司”，不是“股份制有限公司”有什么资格上市和公开发行股票？美国资本市场，至今没有任何一家“单一持

股”的公司能够成功上市。

“一股独大”,已经被全球的资本市场所证明,是上市公司可能爆发重大灾难之源泉。而“单一股本、独家股东”更是资本市场致命的灾祸。刚刚发生的“中航油 5.5 亿美元巨亏”事件，昨天依然经典的“巴林银行 14 亿美元巨亏”案等，都与“一股独大、独股”有着天然无法遏制的血缘关系。“单一、100%股权公司”的根源在于：没有全球所有资本市场——“股份制”的生态环境，也就没有资本市场的“自然制衡”；没有“资本股份制”制衡的公司，让其公开上市则风险无限、将拖累所有的资本市场，其给股票资本市场所带来的灾难，将是无可限量、毁灭性的灾难。于是，具有“100%单一股权”结构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想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英国伦敦、香港股市等资本市场公开发行上市，几乎是绝无可能。“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外上市，存在巨大悬疑。

有著名评论家分析说，为了国家最大的核心利益，为了尽快生成或改变中国国家金融的生态环境，完全没有必要只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来独享 100%的股权，可以让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旗下以及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管辖的国有资本来合股参与，这最起码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了。但中国 55 年以来没有金融生态发展，制衡环境要到什么时间才可以真正生成呢？中国银行 100%资本、股份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独家垄断，令全球对中国金融的“变革”产生狐疑，也令中国的金融改革者十分尴尬。

五、与国际资本市场相兼容

而今的中国上市公司与世界发达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在股份结构形成实践和理论中存在严重的悖论。如美国最著名的可口可乐公司，其第一绝对大股东巴菲特持股只有 8.2%，就已经是最大的股东了。而在中国股市，通常第一大股东控股 51%还嫌不够，还要绝对控股达 70%、80%甚至 90%，这就聚成了资本市场无法阻挡的绝对风险——像“中航油”那样根本无法进行监控和制衡，造成“树倒猢狲

散”、全盘皆输、一败涂地等无法化解的巨大风险。中国资本市场无法抵抗风险，长期衰败，长期长官意志，长期不能与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同步，与这种长期的策略和资本结构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讲，化解或减少金融、股市风险的惟一战略战术，就是减少或分解股份比率，持股比率越均匀，风险则当然最小。正大踏步走向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一股独大”或“垄断独股”是危害中国企业发展壮大的源头障碍，若不能解决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股份制”的“绝对制衡”问题，今后像“中航油”事件那样瞬间倾覆的案例就还会重演，不合理公司的股份结构和体制设置，将成为中国公司长不大、倾覆的最大灾难。

2004 年改制的“中国银行”就是这样，由中国国家中央汇金有限公司“一家独股”占 100%；而新“中国建设银行”则是：中央汇金有限公司占 85.228%，建银投资占 10.653%，东家和本家合股为 95.881%，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上海宝钢集团各占 1.545%，长江电力占 1.030%。从以上可以清晰看出：中国银行业 2004 年所发起“脱胎换骨变革”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依然没有摆脱“单一股东”和“一股独大”的陈规恶习。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根本还没有可能用资本股份制规则去撬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本管理、“资本说话”的正常体制运行，新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依然有再次做出‘呆死坏账’‘不良资产’黑洞的可能。这说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源头管理——“资本说话”的根本结构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治理，中国计划经济特色的“批权”，依然可能在未来的中国金融界大行其道。‘中国特色’放纵了中国金融界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如果这样就算完成了海外上市所要求的国际资本结构的治理改制，那么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资本市场，是否会放“中国银行”一马？并网开一面在数个国际资本市场公开发行上市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六、10000 亿地下金融怎样生死？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中国 20 多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进行实

地抽样调查后得出结论，测算出 2003 年全中国地下金融的绝对规模在 7405 亿～8164 亿元人民币之间。据分析，这一数字到 2005 年会达到 10000 亿元人民币左右。

中国金融业，在绝对国家垄断之下，至今没有形成金融生态的任何良性环境，过分压制则扭曲，目前除了中国金融信贷的地下交易之外，还有中国金融现汇人民币的地下市场，由于长期没有私人及集体或私有合作银行的生存空间，中国地下钱庄、地下银行在 21 世纪初期就有约 8000 亿元人民币规模，已经形成一支重要的金融力量。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以上调查报告对中国 20 多个省市区的数据调查显示：中国“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中国正规金融机构经营全部业务规模的近三成。如此规模的地下金融在今后的金融变革中是生还是死，如何生？如何死？民间金融和地下金融的生死也许取决于金融监管和决策部门的一念间，但其影响绝不可低估。它也许就是考验改革智慧的试金石和指示改革方向的风向标。

七、中国：谁来监督监管者

2004 年 11 月 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现了“王小石事件”，这为中国国家所有的监督机构都拉响了警报：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经济蒸蒸日上的今天，由谁来监督国家机器中的各级监督者？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时诚恳地说“还没有任何机构能监督监管者”。

这次中国证监会的王小石出事了，他就凭一个“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名单就可以白花花的黄金万两，谁可以说今后李小石、张小石、赵小石们等不可以照样如此“发洋财”。以此推而广之，除了中国证券会出现“王小石事件”之外，中国足球、中国电信、中国金融、中国电力等等所有有监督权力——“批权’的职能部门,不都一样可以如此而财源滚滚吗？2004 年 9 月 19 日，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以［银监发（2004）第 59 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取银行业机构监督和业务监管费的通知》，监督机构不就是自己给自己下了一纸批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